

从家族记忆到史乘书写

——南雄珠玑巷新探*

孙廷林

提要：作为家族记忆的“珠玑巷”，至晚永乐年间，已在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中个别地出现。而在史乘文献中，直到嘉靖《南雄府志》，珠玑巷才进入史乘书写。珠玑巷所在之地，宋元时期以沙水墟、沙水驿、沙角镇等知名。宋元至明朝前期，南雄即便存在珠玑巷，也并不引人注意。正德至嘉靖初年，南海梁焯“访求其地”，“言于郡守，树坊表识之”是标志性事件。自此以降，珠玑巷迁民说广泛影响明代中叶以后的珠江三角洲谱牒书写。南雄珠玑巷最终成为承载历史文化和族群认同的地标，更成为珠江三角洲族群、岭南族群乃至海外侨胞文化凝聚力、向心力的象征。

关键词：珠玑巷 家族记忆 史乘书写 谱牒文献

一 “南雄珠玑巷”最早何时出现？

广东南雄珠玑巷、山西洪洞大槐树等移民传说，流传甚广。学者们从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做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相关成果不胜枚举。赵世瑜指出这些移民传说“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的共同问题，并从谱牒资料与地方史乘两个层面，探索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文献记载，由谱牒记载的普遍与地方史乘记载的罕见、滞后，引出有关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的思考。^①

相比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在华南乃至海外影响广泛，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话题。相关成果大致可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南雄珠玑巷迁民相关的地方文献、族谱文献等资料的整理汇编^②；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相关研究侧重于考辨传说与史实基础上，分析珠玑巷迁民原因与影响，特别是对珠江三角洲开发的意义^③；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着重从明清国家与华南宗族互动关系的视角，揭示珠江三角洲族谱文献中以“南雄珠玑巷迁民传说”建构

* 本文为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演进的岭南脉络研究”（项目编号：2020GZGJ200）成果之一。

① 参见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② 主要有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等组织编印的珠玑巷系列图书，如《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年）、《珠玑巷古今》（1995年）、《珠玑巷传说与掌故》（花城出版社，2002年）等。

③ 如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曾昭璇、曾宪珊等编著《宋代珠玑巷迁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珠玑巷人迁移路线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宋珠玑巷罗贵家南迁记》（2002年）等。

起家族谱系。^①

“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是这些移民传说的共同特征。因而从文献学角度，精确判定迁民传说的出现及其流变，的确相当困难，却又很有必要。论及南雄珠玑巷，学者们大多引屈大均《广东新语》为据。《广东新语》二次提到南雄珠玑巷：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粉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②

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③

二说分别被称为南雄珠玑巷得名的“祥符说”“敬宗说”。依前者，南雄珠玑巷应当出现在两宋之际；按后者，南雄珠玑巷则出现于晚唐。二说孰是孰非，本文不拟评述。屈大均已明末清初人，二说应不始于屈大均，而当另有所本。

那么南雄珠玑巷及其迁民传说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陈乐素认为珠玑巷迁民传说的出现不早于明代，明中叶以后珠玑巷迁民传说渐盛。^④日本学者井上徹推测认为，明代中叶以前珠玑巷传说已在民间流传，从明代中叶开始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得到普及。^⑤谭棣华认为明初里甲制度史实与珠玑巷迁民传说产生密切相关。^⑥南雄珠玑巷迁民传说出现时代的探讨，主要观点大体如此。

上述有关南雄珠玑巷及其迁民传说最早出现时间的观点，往往综合多方面因素作出推定。在广泛爬梳谱牒文献、地方史乘文献基础上，通过缜密的实证性研究，将有助于得出更确切的认识。本文无意于探讨南雄珠玑巷迁民传说与考证相关史事，仅集中考究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珠江三角洲诸大家族历史记忆的“南雄珠玑巷”，在谱牒文献等口述性质的文本中^⑦，最早是何时出现的。二是作为南雄实在地名的“珠玑巷”，最早是何时进入史乘书写的。在考证这两个问题基础上，对南雄珠玑巷迁民传说进行再认识。

① 参见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王鹤鸣等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159页）、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井上徹：《中国的系谱与传说——以珠玑巷传说为线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冀满红：《民众迁徙、家园符号与地方认同——以洪洞大槐树和南雄珠玑巷移民为中心的探讨》（《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等。

② 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2《地语》“珠玑巷”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③ 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2《地语》“珠玑巷名”条，第59页。

④ 参见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

⑤ 参见〔日〕井上徹：《中国的系谱与传说——以珠玑巷传说为线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

⑥ 参见谭棣华：《从珠玑巷史实联想到的问题》，《广东历史问题论文集》，稻禾出版社，1993年，第307—332页。

⑦ 谱牒文献的口述性质，参见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42页。

二 家族历史记忆中“珠玑巷”溯源

传说与谱牒均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1957年印行的黄慈博遗著《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以及1994年出版的《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汇集有较为丰富的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刘志伟、谭棣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较为广泛地使用了颇多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这些谱牒文献对南雄珠玑巷、珠玑巷迁民传说的记载，反映出在明代中期，南雄珠玑巷迁民传说已经相当成熟而普遍。溯源“南雄珠玑巷”，则有必要进一步向明初、明前期的谱牒文献追溯。

（一）《庐江郡何氏家记》（宣德九年，1434）中的“珠玑巷”

明前期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中，成书于明宣德九年的《庐江郡何氏家记》（以下简称《家记》）值得重视。^①洪武五年（1372），何真曾“辑录家记与义祠遗训”，并传示宋濂作序。宋濂文集中有《惠州何氏先祠碑》记述何真一系列敦睦宗族之举。洪武二十年，何真命其子崇祖“携家记并遗训及诗文回惠，藏于义祠”。《明史·艺文志》所载：“何荣祖《家记》一卷，何真子纪真事。”当是在何真辑录本基础上，其长子何荣祖所编集。洪武二十六年受蓝玉案牵连，何氏“阖族丧于非命，祠废《记》亡”。洪武三十一年大赦，何崇祖劫后余生，至宣德九年，他搜集散佚，重新辑撰成《家记》。^②万历三十二年（1604），何崇祖《家记》由何氏后人刊刻。因此，今所见万历刻本何崇祖《家记》，实际成书于宣德九年，且是在洪武年间何真、何荣祖基础上辑录而成。

《家记》中涉及“珠玑巷”的相关信息，值得甄别。首述何氏源流，始祖乾符在宋室南渡后“由南雄郡宝昌县沙水乡七星树下珠玑巷”，南下抵东莞^③，出现“宝昌县”“沙水乡”“珠玑巷”等标志性地名。《家记》以编年记事，洪武四年何真返广“收集头目军士”后回京，往返途径梅关、南雄，作诗多首。其中《经南雄谒鼻祖何将军庙》诗云：“王事驱驰暂息鞍，碧潭犹有古祠存。派分东莞员山何，本出南雄沙水村。袅袅香烟腾虎踞，雍雍旭日覆龙蟠。登临再拜频惊讶，我是云仍宗子孙。”^④这首诗颇值得推敲。

首先是这座位于沙水镇的“何将军庙”。据景泰七年（1456）成书的《寰宇通志》载：“何公庙，在府城东三十里。志亡其名，后周为广东参军，往征南海，死于贼。乡人为之立祠，凡有祷辄应。宋熙宁中，赠侍御清海军使。”^⑤可知“何将军”乃是一供民众祈祷祠神。何真诗中一方面认可东莞何氏“本出南雄沙水村”之说，另一方面将何氏称为何将军“云仍宗子孙”，何真又“频惊讶”，反映出庙中供奉的“何将军”与珠三角何氏关联起来的说法尚不普遍。综上所述，明初洪武年间，何真在诗中明确提到“南雄沙水村”，与何真直接相关的材料尚未提及“珠玑巷”。至迟在宣德九年何崇祖辑录本《家记》中，或出现“珠玑巷”之名。

（二）黎贞《秣坡集》中的“珠玑巷”

明前期珠江三角洲士人文集中存有颇多谱牒文献。其中新会人黎贞《秣坡集》中二篇族谱

① 《庐江郡何氏家记》的文献价值及研究利用，参见汤开建：《元明之际广东政局与东莞何氏家族》，《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参见何崇祖：《庐江郡何氏家记》，“玄览堂丛书续集”，正中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册，第304页。

③ 参见何崇祖：《庐江郡何氏家记》，“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册，第306页。

④ 参见何崇祖：《庐江郡何氏家记》，“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册，第405—406页。

⑤ 陈循修：《寰宇通志》卷103《南雄府》，“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7册，第428页。

序文，出现“珠玑巷”的记载。黎贞字彦晦，号秣坡，是元末明初岭南名儒。^①《秣坡集》中《李氏家谱序》《后晋朝请大夫行录记铭》二篇文献出现有关南雄珠玑巷的记载。有研究认为这是目前所知有关南雄“珠玑巷”之名的最早记载。^②《秣坡集》最早刻于嘉靖年间，今存世三种清代刻本：康熙丙寅（1686）重刊本、嘉庆二十二年（1817）都会书屋刻本、光绪元年（1875）重辑刻本，三种刻本或称《秣坡先生集》或称《秣坡先生文集》，均为8卷（诗3卷、词1卷、文4卷）。《李氏家谱序》《后晋朝请大夫行录记铭》二篇文献在三种刻本中均有保存。下文征引以嘉庆二十二年都会书屋刻本为据。

黎贞《李氏家谱序》可证明南雄“珠玑巷”之名的出现，不晚于永乐年间。据《李氏家谱序》，李氏家族子弟“平林之子成秀，君燧之子存德、存道，侄泰”等师从黎贞，“手录世次”，求黎贞作谱。序文称：“岭南之李，惟南雄始兴为盛。宋季有侃、徇、佺兄弟，奉母褊氏，由南雄珠玑巷迁广郡之高第街。侃、徇分居南海、香山，佺奉褊氏至新会。”^③这篇序文的写作年份虽不能精确确定，但可定在永乐十四年（1416）黎贞去世之前。

在《后晋朝请大夫行录记铭》中，不但出现“珠玑巷”之名，还出现目前所见“珠玑巷”得名之“敬宗说”的最早记载。该文称“公讳昌，姓张氏，其先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也。始祖讳辙，生子兴，七世同居。唐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④屈大均《广东新语》之“敬宗说”，据此当可以溯源至明代前期。据文中称张氏子弟“盥手书公行录，谒予正之，予辞弗获，乃为铭之”，即文中所述家族史、迁移世系等，实际上出自修纂族谱的张氏家族子弟口述性质的史料。这篇文献中，既有“御营使”“常平司”“金紫厢”“常平司官田”等属于唐宋制度的专称，也有“粮长”等明初才出现的专称。文中出现的少一公、通七公、有六公、有九公等人名，这种结构的数目性名字，应是宋元时期南方社会较为普遍现象。^⑤除见于《秣坡黎先生集》外，《后晋朝请大夫行录记铭》还见载于民国《开平县志·金石略》，称这篇《行录记铭》“刻在沙冈张氏始祖庙”，末署“永乐九年辛卯月邑人黎贞撰”^⑥。据此可知，这篇序文应写于永乐九年（1411）。

综合上述谱牒文献，南雄“珠玑巷”之名，至晚在永乐年间，已经出现在珠江三角洲族谱文献中，珠玑巷得名之“敬宗说”也已出现。

（三）其他明前期谱牒文献中情况

不过，明代前期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中，南雄珠玑巷尚远未成为普遍现象。比黎贞稍晚东莞

① 黎贞事参见倪尚明：《黎贞及其〈秣坡集〉》，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② 倪尚明《黎贞及其〈秣坡集〉》（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最早指出这一点，但其文未就此问题深入展开，亦未引起研究者注意。

③ 黎贞撰：《秣坡黎先生集》卷5《李氏家谱序》，“广州大典”，广州出版社，2017年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2册，第154页。

④ 黎贞撰：《秣坡黎先生集》卷7《后晋朝请大夫行录记铭》，“广州大典”，集部别集类第2册，第200—201页。

⑤ “少”“通”“有”为表辈分的字。参见魏亦乐：《宋元时期数目字人名新说——以新发现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及宋元碑刻文献为线索》，《史语所集刊》第91本第1分册，2020年3月，第33—80页。

⑥ 民国《开平县志》卷41《金石略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34册，第585—586页。

人陈琏(1369—1454)《琴轩集》中,保存大量族谱序文、墓志文,引起研究者重视。^①笔者核查发现,在涉及珠江三角洲家族的族谱序文、墓志表文中,明确提到自南雄迁徙到珠江三角洲的有16姓(含三支何氏),其中东莞翟氏、宝安蔡氏具体到自南雄“凌江”^②;东莞赤冈何氏、西城何氏、宝安何氏均徙自南雄“沙水”“保昌县沙水里”^③;李氏、封氏、丁氏徙自南雄“保昌”^④;其他七姓(黄氏、罗氏、刘氏、陈氏、梁氏、林氏、伍氏)概言徙自南雄。^⑤此外,《番禺礼园黎氏族谱序》(正统二年,1437)中出现“南雄朱紫巷”之说。^⑥这是目前所见南雄“朱紫巷”最早文献记载。

东莞人罗亨信(1377—1457)《觉非集》中,有两篇族谱序文提到自南雄迁徙到珠江三角洲,其中一篇具体到南雄“凌江”^⑦。黎贞《林坡黎先生集》记载新会伍氏徙自南雄“凌江”^⑧。宋濂《番禺蒙氏谱序》、杨士奇《赠中宪大夫督察院右佥都御史罗君墓表》等,涉及珠江三角洲家族谱牒世系,亦均仅言及“南雄”。

综合这些明代前期的谱牒文献,多记载其家族来自南雄(或以南雄中转),这是岭南移民史的真实反映。具体迁徙自南雄的什么地方,保昌、凌江、沙水、珠玑巷、朱紫巷等诸多地名,在这些明前期谱牒文献中均有或多或少出现,而没有一致指向,更没有普遍指向“珠玑巷”。陈琏《番禺礼园黎氏族谱序》中“南雄朱紫巷”之说,似更反映出早期谱牒文献指称并不一致。换言之,虽然至晚永乐年间,“南雄珠玑巷”已在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中出现,但也只是标识家族所自的诸多地标之一。

家族传说和谱牒文献,是承载基层民众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至晚永乐年间“珠玑巷”之名已出现谱牒文献中,这显示承载珠江三角洲家族历史记忆的珠玑巷迁民传说,应在此前便已出现。在明代前期的珠江三角洲族群家族史记忆中,祖先故园虽都在南雄,但在具体地点上存在“保昌、凌江、沙水、珠玑巷、朱紫巷”等种种不一。诸多明确指向的具体地名,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家族传说和谱牒记载的叠加、认定。在种种不一的指称中,“珠玑巷”尚没有表现出绝对优势,尚未成为珠江三角洲族群家族史记忆的共同地标。

① 据陈宝霖统计有关东莞氏族源流文献达56篇之多。何乐素《珠玑巷史事》据之指出陈琏《琴轩集》“都只说他们‘先世南雄人’,而不言珠玑巷”(《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6页)。倪尚明也认为,珠玑巷在明初,即洪武、永乐年间并不出名,所以当时更多的族谱文献并不说“珠玑巷”(参见《黎贞及其〈林坡集〉》,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② 参见陈琏著,杨宝霖整理:《琴轩集》卷17《东莞翟氏族谱序》、《宝安蔡氏族谱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980、1076页。

③ 参见陈琏著,杨宝霖整理:《琴轩集》卷17《宝安何氏族谱序》、卷19《何氏族谱序》、附录《陈琏诗文辑佚》卷2《东起何公小传》,第1014、1265、2025页。

④ 参见陈琏著,杨宝霖整理:《琴轩集》卷17《丁氏族谱序》《李氏族谱序》《封氏族谱序》,第1023、1026、1061页。《丁氏家谱序》称丁氏“南雄丁家洞人”,附录《陈琏诗文辑佚》卷2《雪村处士丁公墓表》称南雄保昌人(第2071页)。

⑤ 参见陈琏著,杨宝霖整理:《琴轩集》卷17《宝安椎山黄氏族谱序》《宝安罗氏族谱序》《长表刘氏家谱序》,第987、1001、1059页;卷26《云轩处士伍公墓志铭》,第1634页。附录《陈琏诗文集辑佚》卷2《林卢公行状》《梁子正公墓志铭》《陈先生墓志铭》,第2028、2042、2045页。

⑥ 参见陈琏著,杨宝霖整理:《琴轩集》附录《陈琏诗文辑佚》卷2《番禺礼园黎氏族谱序》,第2016页。

⑦ 罗亨信:《觉非集》卷2《城北何氏族谱序》,“广州大典”,广州出版社,2017年影印本,集部别集类第2册,第268页。

⑧ 黎贞撰:《林坡黎先生集》卷5《伍氏族谱序》,第156页。

三 史乘书写中“珠玑巷”溯源

今南雄珠玑巷作为一处享誉海内外的地标，位于广东南雄市东北方向，南起驷马桥，北至凤凰桥，不足两公里长，是梅关古道的必经之路。目前多数论著一般根据珠玑巷得名“敬宗说”，把珠玑巷地名出现的时间定在晚唐。如《广东省志·地名志》载：“珠玑镇，南雄县辖镇，在县境中北部。因境内有珠玑古巷得名。……镇人民政府驻沙水圩……沙水圩附近的珠玑古巷，传为珠江三角洲一带居民的祖居。”^①同书载：“沙水，在南雄县城北9公里。珠玑镇人民政府驻地。唐称珠玑巷，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改称沙水驿。古代粤赣边区商业重镇。南宋时商贩居民达1000多户。圩原址在珠玑街，1969年迁现址建圩。”^②该作认为唐代已有“珠玑巷”之地名，提及的沙水驿、沙水圩等是与“珠玑巷”密切相关的地名。《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亦称：“珠玑巷，初名敬宗巷，唐宝历间改称珠玑巷。”^③其将南雄“珠玑巷”这一地名的出现时间，定在唐宝历年间，所据实质上是上文论及的“敬宗说”。

（一）宋元史乘中频现的“沙水驿”等地名

据“敬宗说”把南雄“珠玑巷”这一地名的出现定在唐代，而唐宋元文献中却难以看到对“珠玑巷”的丝毫记载，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明代中期珠江三角洲杰出士人黄佐有“涉沙水、访珠玑”^④之说，足见“沙水”实与“珠玑巷”关联密切。宋元史乘文献虽不见记载“珠玑巷”，而与“珠玑巷”存在极密切关系的“沙水村”“沙水墟”“沙水驿”等地名则频频见于记载。《诗人玉屑》记载北宋末“岭下保昌县沙水村进士徐信”与苏轼交往。^⑤《宋会要》在北宋治平以前各地盐额的记录中，南雄州下列有“沙水墟”^⑥，说明保昌县沙水村在北宋当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墟市。

南雄治所即保昌县城所在，当“二广咽喉之地，往来憧憧于此憩息，舍舟而途，越岭而江，必盘泊信宿而后行”^⑦。可见当时其已成为南来北往客商的中转站、补给站。南雄城内八使行衙、寄梅驿，城南凌江馆等均是宋元时期重要驿馆。今珠玑巷所在之沙水驿，位于南雄城东北；据载“城之东沙水、怀德二驿，直至梅峤”^⑧，可见沙水也是一处重要驿馆，至南宋、元朝时，称为沙水驿、沙水铺。《永乐大典》存元代《南雄路志》载：

沙水驿，距城二十五里，旧以驿铺厅字为之，非士夫偃泊之地。嘉定四年，郡守邹公孟卿移汉节亭向北，以为厅事，规模未暇开广。嘉定己卯，郡守孙公崇下车未几，即鼎新之，门庑厅堂，悉如常式，端平甲午，郡侯张友委保昌尉上官启宗修葺，轮奐一新。至是近郊亦

①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地名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②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地名志》，第214页。

③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7页。

④ 郭棐纂：万历《广东通志》卷32《郡县志·南雄府》，“广州大典”，广州出版社，2017年影印本，史部方志类第5册，第761页。

⑤ 参见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卷8“王平甫”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246页。

⑥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三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490页。

⑦ 黄慈孙：《南雄路志》，《张国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716页。

⑧ 黄慈孙：《南雄路志》，《张国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第717页。

足以憩憧憧往来之客矣。^①

传铺攸关国家文书急递，南雄共设九处传铺，分属保昌、始兴两县，沙水铺是九处传铺之一。^②由上文可知，作为驿馆的沙水驿，附设在传铺沙水铺中，起初较为简陋狭窄；至嘉定、端平年间，屡经整修，规模扩大，设置完备，成为南北官员士子商客憩息之所。

随着人口聚集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时，南雄沙水一带形成沙角镇，置有沙角巡司。嘉靖《南雄府志》载四十二处“古迹”，其中“沙角巡司”就位于沙角镇。^③嘉庆《一统志》载“沙水镇，在州东北三十里，宋嘉定中尝置沙水驿，后又置沙角巡司于此”^④。因南北商旅往返于此，宋代南雄沙角镇相当知名，乃至被说话人采用。宋代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敷演的就是发生在梅岭、南雄沙角镇的故事。^⑤宋代的沙角镇即明清时期的沙水镇。从北宋到明清，此地经历沙水村、沙水墟、沙水驿（铺）、沙角巡司、沙水镇的发展变化。

明前期依据《天下府州县卫所宣慰宣抚招讨司志书》等编纂、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的《寰宇通志》，明确记载了至今仍是“珠玑巷”标志性建筑的两座桥梁——驷马桥、凤凰桥。“驷马桥，在府城东三十里，邑人顾希甫与子袞相继登科，后同还乡，经此桥，因名。”又言：“凤凰桥，在府城东北四十里，宋景德中有凤凰集于溪岸，因名。”^⑥嘉靖《南雄府志》记载，驷马桥位于城东三十里，凤凰桥位于城东北三十里，更明确记载驷马桥又名沙水桥，嘉定九年（1216）以石创建。^⑦《寰宇通志》已经记载了驷马桥、凤凰桥等至今仍是南雄珠玑巷的标志性景观，而“珠玑巷”一名却仍丝毫未见诸记载。

通过勾稽梳理上述宋元及明前期文献，今南雄珠玑巷所在之地，在宋至明清时期的发展沿革约略可考。宋元时期，此地就是南北客商憩息停泊之地，以沙水村、沙水墟、沙水驿（铺）、沙角巡司（沙水镇）等名，频见文献记载。如前文所论，至晚在永乐年间珠江三角洲少数谱牒文献中，已出现把“珠玑巷”作为迁徙所自的记述，同一时期南雄地方史乘中并不见“珠玑巷”这一地名。虽不能否定明初南雄存在“珠玑巷”这一地名，但即便存在，也当不为时人所注意。

（二）“珠玑巷”在史乘书写中出现与演变

“珠玑巷”作为一处地名出现在地方史乘中，要晚至嘉靖《南雄府志》。嘉靖《南雄府志》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载四十二处“古迹”，其中位于沙水镇的有沙角巡司、沙水驿和珠玑巷三处。而关于珠玑巷的，则只有“珠玑巷，在沙水寺前”，寥寥数字。沙水寺则是一处较小的寺院，嘉靖《南雄府志》记载佛寺17处、佛院27处，沙水寺是27处佛院之一，“（在）沙水镇，宋德祐元年创”。另，该志对沙水驿的记载也远比珠玑巷详细：“沙水驿，在沙水镇，嘉

① 黄慈孙：《南雄路志》，《张国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第717页。

② 参见黄慈孙：《南雄路志》，《张国淦文集四编·永乐大典方志辑本》，第718页。

③ 参见谭大初纂：嘉靖《南雄府志》卷上《提封·古迹》，“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南雄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1册，第57页。

④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54《南雄府》，四部丛刊续编本。

⑤ 参见洪楫辑，程毅中校注：《清平山堂话本校注》卷3《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华书局，2012年，第207—229页。按，该文作“沙角镇”，其校注（九）把“沙角镇”认定在东莞沙角山，误，《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明言沙角镇在梅岭下、属南雄，故此沙角镇亦便是明清时期的沙水镇。

⑥ 《寰宇通志》卷103《南雄府》，“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7册，第428页。

⑦ 参见谭大初纂：嘉靖《南雄府志》卷上《营缮·桥梁》，第64页。

定辛未知州邹孟卿即汉节亭改创。己卯知州孙崇修，保昌令傅烈记。”^①此外，珠江三角洲著名士人黄佐纂修嘉靖《广东通志》也同样记载：“珠玑巷，在沙水寺前。”^②虽相较沙水驿、沙水寺，该志关于珠玑巷的记载仍是过于简略，但却是“珠玑巷”正式作为一处“古迹”进入地方史乘书写的标志。

值得思考的是，何以在嘉靖年间“珠玑巷”标志性地进入南雄地方史乘书写之中？黄佐（1490—1566）在《承德郎兵部主事象峰梁公墓表》中记述值得重视。“象峰梁公”指的是南海人梁焯（1482—1528），字日孚，号象峰，正德九年（1514）进士、会元。该《墓表》称：

先世以客户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君尝访求其地，言于郡守，树坊表识之。^③

因其家族谱牒文献久有“自南雄珠玑巷迁来”之说，故梁焯前往南雄寻访祖居地“珠玑巷”。考梁焯生平仕历，正德九年九月至正德十二年（1517），丁父忧，居乡守丧；十二年赴京，途中追随王阳明讲学，至十三年入京。嘉靖元年（1522）九月告病还乡，嘉靖七年去世。^④据此，其到南雄寻访珠玑巷的时间，或在中进士之后。因此可以说梁焯赴南雄寻访“珠玑巷”的时间，便当在正德年间，至晚在嘉靖初年。

“访求其地”，似反映出此前“珠玑巷”不为南雄当时人所知；“言于郡守，树坊表识之”，一是把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中有关珠玑巷迁民之说传播给南雄地方官员，二是通过树立牌坊碑表，来标识、确定“珠玑巷”位置所在，把沙水镇上驷马桥、凤凰桥作为标识来认定为珠玑巷。据此，南雄“珠玑巷”应是经南海士大夫梁焯“访求其地”，且“言于郡守，树坊表识之”，然后方才为南雄地方所注意。换言之，很可能到此时，珠玑巷方才成为南雄的一处地名。也正是在此之后“珠玑巷”开始作为一处地名进入地方史乘嘉靖《南雄府志》之中。

作为一处“古迹”，“珠玑巷”之名极其简略地出现在嘉靖《南雄府志》中。此后“珠玑巷”逐渐较多地出现在士人诗文、笔记之中。在嘉靖《南雄府志》之后，随着珠玑巷迁民传说普遍传播，南雄地方文献对其记载也渐丰富。康熙《南雄府志》载：“珠玑巷，沙水寺前。人世传广州府属显宦望族，如梁、霍、方、何、黄、陈、李、容诸姓，俱发源于此。”^⑤此载显示清初珠江三角洲的珠玑巷移民传说，已进入南雄地方志书书写。乾隆《保昌县志》、乾隆《南雄府志》中，古迹部分未出现“珠玑巷”，而均以“敬宗巷孝义门”代之。^⑥用“敬宗巷孝义门”指称为珠玑巷，反映出源于谱牒文献中珠玑巷得名的“敬宗说”，为地方史乘所接受。

① 谭大初纂：嘉靖《南雄府志》卷上《提封·古迹》，第57页。

② 黄佐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卷19《舆地志七·古迹》，“广州大典”，广州出版社，2017年影印本，史部方志类第2册，第294页。

③ 黄佐：《泰泉集》卷49《承德郎兵部主事象峰梁公墓表》，“广州大典”，集部别集类第7册，第606页。

④ 参见黄佐：《泰泉集》卷49《承德郎兵部主事象峰梁公墓表》，“广州大典”，集部别集类第7册，第606页。

⑤ 陆世楷纂修，姚昌胤续修：康熙《南雄府志》卷5《营建志·古迹》，“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南雄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1册，第250页。

⑥ 参见陈志仪纂修：乾隆《保昌县志》卷3《舆地志·古迹》，“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南雄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4册，第601页；胡定纂：乾隆《南雄府志》卷3《舆地志·古迹》，“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南雄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影印本，第1册，第351页。

综上所述,在宋元时期,今“珠玑巷”所在之处经历了沙水村、沙水驿(铺)到设置沙角巡司、沙水镇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相关文献不乏对驷马桥、凤凰桥等标志性地名的记载,但唯独不曾记载“珠玑巷”这一地名。唐宋元时期南雄“珠玑巷”作为一处地名存在,是值得怀疑的。“珠玑巷”作为一处地名,引起南雄地方士人注意应当是到正德年间,南海士人梁焯寻访其地,树立坊表之后。换言之,作为南雄一处地名的“珠玑巷”,很可能经历了由虚到实的过程——即从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层面的地名,到现实中南雄实有其地的过程。明清南雄地方史乘对“珠玑巷”记载的变化,较为清晰地显示出,珠三角族谱文献中的“南雄珠玑巷”及其迁民传说,在南雄当地的落地过程。

余 论

从史乘记载看,今珠玑巷所在地,自宋元便以沙水墟、沙水驿、沙水铺、沙角镇知名。不论南下仕宦、经商,还是离乱迁移,途中经此停留、中转乃至定居,此地自然成为珠江三角洲族群历史记忆中印象深刻之地。明代前期谱牒文献中不乏“沙水”“沙水村”“沙水里”等记载,便是这种族群迁移历史记忆的反映。在明代前期乃至明初个别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中,南雄珠玑巷(或称朱紫巷)之名已经出现。由此推测,与“珠玑巷”相关的“胡妃”“罗贵”等迁民故事可能也已在传说着。珠江三角洲族群迁移的历史记忆,在传说中丰富、叠加着,并被逐渐记载进承载家族记忆的谱牒文献。

伴随珠江三角洲士大夫话语对南雄珠玑巷的建构与强化,更多对祖先和家族历史记忆空白的珠江三角洲族群,接受并通过这一共同传说的层累与强化,来强化族群认同,从而用公共记忆工具填补自己家族的记忆空白。^①明代中期(黄萧养之乱)后,一方面,国家要通过户籍去甄别叛乱者;另一方面,军户要把自己军籍的身份脱去,这二重因素推动珠玑巷传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被普遍采纳。^②也就是说,明代中期以降,多种因素推动珠玑巷迁民成为珠江三角洲诸多家族共同的家族记忆。

宋元时期乃至明朝前期,南雄很可能并不存在“珠玑巷”这一地名,即或存在也并不引人注目。珠玑巷,从出现在珠江三角洲谱牒文献中,到落实为南雄一处地名并为南雄地方熟知,这一过程当在明代中前期完成。正德至嘉靖初年,南海梁焯“访求其地”“言于郡守,树坊表识之”,是这一过程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在嘉靖《南雄府志》中珠玑巷首次进入南雄地方史乘书写,并被不断丰富。明代中期以降,有关珠玑巷的传说、谱牒文献的记载、诗词吟咏等愈来愈多。南雄珠玑巷成为一个承载历史文化和族群认同的地标,已不单是移民史上的重要地名,更成为珠江三角洲族群、岭南族群,乃至海外侨胞文化凝聚力、向心力的象征。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参见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组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参见刘志伟:《“移民”:户籍制度下的神话》,《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1年第25期。